



# 出身印尼的首位华侨市长

## 石琪高历尽坎坷业绩辉煌(一)



石琪高

“坎坷可能是人生的财富”，这是在印尼教育成长，历尽坎坷苦难而成为中国首位华侨市长、著名教育家和作家石琪高先生讲出的名言。

中爪哇马吉朗福清乡亲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培育了一位杰出的儿子石琪高，他在马吉朗马华学校、在日惹中华学校读完初中，在巴中毕业后回到中国，考进清华大学工程系。毕业后历尽大起大落坎坷，改革开放时代，成为中国第一位华侨市长，在广西柳州大展才华，为建设新柳州和广西理工大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闻名华夏和海外。退休后他积极写作，叙述人生感悟，总结工作经验，先后出版了四本著作，德高望重，受到各界的崇敬。

### 居留印尼十四年

石琪高是什么人？有什么杰出贡献？

他于1932年7月出生在福清市江阴镇下石村，1938年6岁时随母

亲来到中哇马吉朗投靠父亲，在印尼居留了十四年，到1952年7月才回国深造。

石琪高自小在马吉朗马华学校读书，历经日军侵占苦难，小学毕业转到日惹中华读到初中毕业，高中就读于雅加达巴城中学，1952年届毕业，适才组织七百多学生回国，在中国清华大学毕业后，历经反右运动和文革狂风暴雨，改革后从粗工、工程师到市长、大学校长，声名显赫，业绩辉煌。

石琪高现年八十岁，身强体壮，几年前他向记者叙述了一生大起大落的经历。这儿摘录一些重要段落如下：

我于1932年7月出生在祖籍地福建省福清市江阴镇下石村。由于姓氏宗族矛盾的原因，我们姓石的家族在村里受到了排斥，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全家生活不仅很困难，精神上也非常非常的压抑。由于生活所迫、环境所逼，1920年我父亲就跟随祖父到印尼谋生去了。出国后，父亲极少回来，每次回来都是白天在家，晚上躲在亲戚家。只要回来，村里人就知道了。就会有人上门借钱，明则借钱，实则老虎借猪，有借无还。他们认为归国华侨必定有钱。1931年我父亲最后一次回

来，也只是夜里进村，住在亲戚家，第二天天不亮就匆匆地走了。

父亲这次回家时，母亲怀着我，没有随父亲同行。1938年我六岁时，母亲带着我离开了福清老家到印尼去找我父亲。我还有两个姐姐留在了家乡福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在家里不会有什么危险，那些人到我家里，要不到钱不会抓女孩子，但会抓我。所以我母亲不得不把我带到国外，而把姐姐留在了福建农村。后来，我大姐嫁了出去，二姐做了别人的童养媳。

我在印尼呆了十四年，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中毕业。1952年7月回国，我记得很清楚，是7月7日那天到北京的北京。我在北京华侨补校学习和工作一年，1953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 一、日侵被折磨

我随母亲出国后，就在印度尼西亚马吉朗市读书，高中则是在巴城中学读的。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雅加达市叫巴达维亚市，简称巴城，巴城中学的校名就是这么来的，巴城中学在印尼是一所很有名的华侨学校，当年从巴城中学回国的印尼华侨学生很多，现在国内还有印尼巴城中学的校友会。

1943年日本入侵



石琪高到柳南执法局参观。

### 石琪高到柳南执法局参观

占印尼，我们兄弟姐妹就没有办法再读书了，只好帮父亲做些买卖。我父亲开始做的是放高利贷的生意，后来干不下去了，就搞起了养猪场，养了一百多头猪。我没法念书，就每天骑着单车到养猪场帮父亲干活。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印尼的时候，在当地养了一批印尼人充当雇佣兵，在中国国内这样的军队叫伪军、二狗子。雇佣军在印尼马吉朗市各地设有很多岗哨，规定中国人经过岗哨时必须鞠三个躬才能过去。我每天骑车去帮父亲干活都必须从岗哨经过，岗哨设立之初我还不知道这个规定，经过那里雇佣军喊我停下来的时候，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过去并没有岗哨在那里把守，我当时又是那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什么都不在乎，就没听岗哨的招呼。几个雇佣军看

我不理睬就火了，接着就是几声枪响。我根本没想到他们会对买卖。我父亲开始做的是放高利贷的生意，后来干不下去了，就搞起了养猪场，养了一百多头猪。我没法念书，就每天骑着单车到养猪场帮父亲干活。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印尼的时候，在当地养了一批印尼人充当雇佣兵，在中国国内这样的军队叫伪军、二狗子。雇佣军在印尼马吉朗市各地设有很多岗哨，规定中国人经过岗哨时必须鞠三个躬才能过去。我每天骑车去帮父亲干活都必须从岗哨经过，岗哨设立之初我还不知道这个规定，经过那里雇佣军喊我停下来的时候，我也没太在意，因为过去并没有岗哨在那里把守，我当时又是那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什么都不在乎，就没听岗哨的招呼。几个雇佣军看

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雇佣军之所以这么欺负我，没有其他的原因为我是华侨。日本强盛，他们就可以给日本人当“二狗子”，中国贫弱，他们就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没有强大的祖国作为靠山，华人在海外定会遭到欺辱，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心灵深处就扎下了这个根，我是中国人，长大后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我为什么那么爱国，为什么要动员那么多人回国来，除





# 出身印尼的首位华侨市长

## 石琪高历尽坎坷业绩辉煌(二)

了在华侨学校接受的教育外,就是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心底里我向往着自己的祖国,盼望着祖国强大,盼望海外华侨能够真正扬眉吐气。中国站不起来,海外华侨就抬不起头来,什么时候都是海外孤儿,不仅日本人侵占中国人,就连当地日本雇佣军也欺辱我们中国人。在印尼,我们家的东西多次被抢劫,明明知道是谁抢的,母亲就是不让我还手,生怕惹怒了当地人。在中国没有强大起来之前,华侨在国外是处处受欺侮的,这是我非常痛苦的一段经历。

### 二、巴中严师教导

后来我父亲的生意做的还不错,家庭生活也慢慢好起来,吃穿住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我是在印尼马吉朗市念的小学,印尼日惹市念的初中、高中则考入了雅加达的巴城中学。当时雅加达有三所华侨中学,即是巴城中学、中华中学和八华中学,巴城中学和中华中学是非常倾向中国内地的。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就参加过进步读书会。我记得很清楚,在读书会里我看的第一本书就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第二本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两本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基本上奠定了我此后的思想基础。

到了高中,我受国内进步思想的影响也越来越深,我们一些同学自发成立了进步组织。我在巴城中学读书时接触到的大部分老师都来自国内,我的语文老师叫钟士明,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去了香港,十几年前我到香港还见到了他。教我代数的老师叫刘宏读,毕业于国民党时期国立南京中央大学。他的弟弟叫刘宏谦,是教我几何和三角的老师,也是国民党时期国立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还有一个教我们化学的老师也是国民党时期国立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她叫胡世查。

这些老师都很不简单。我们巴城中学的师生,新中国成立后有80%都回到了祖国。巴城中学学生的学习成绩也都非常好,我后来之所以能考上清华大学,与在巴城中学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当时巴城中学全部都是用中文教学,主课语是中文,外语是英文,课本基本上都是中国内地传过去的。虽然我是在印尼念得高中,但是教我的老师是由中国去的师资,所学的教师材大部分是和国内一样的。所以,我回国后很快就能与国内教育的内容和步骤

接上了,教我的还有一位物理老师叫韦同芳,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大学)毕业的,教的非常好,我回国考试,成绩最好的就是物理,他对我们要求相当严格。即使后来回国后我被打成“右”派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把祖国当成母亲,我也认为那是母亲打错孩子,但母亲终究还是母亲。

当年回国的主要原因就是向往祖国。1950年已有一批印尼青年学生回国,我们1952年回国的是第三批。我们一批共有724人,由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带队,称做华侨回国学生升学团。我们回国完全是自发组织的,直接目的就是到祖国继续念书,有回来考初中的,也有回来考高中的,我是回来考大学的。我们回国的一路上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我出国是随母亲出去的,父亲到雅加达市码头接的我们,我回国也是父亲送我的。我记得当时父亲从三宝壟坐火车把我送到雅加达,然后从雅加达坐船回国。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还比较困难,吃的很不好,吃的第一餐是盐粥。后来到北京也慢慢想通了,经过一些系列的思想教育,我们也了解到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可



石琪高挥笔写书法

### 石琪高挥笔写书法

能很舒适,我们的心绪也逐步平静了。

在印尼雅加达巴城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兼了一些职务,但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到了北京,在华侨补校学习和工作了一年,我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我的作文考的很好,作文题目是“记述一件新人新事”。我写的是朝鲜战场上的空军英雄张积慧。在补校学习期间,学校组织我们听了很多英雄模范人物的报告,我对赴朝参战的空军英雄张积慧的报告印象最为深刻。他在赴朝参战以前驾驶的飞机的时间才有两个多月,就凭着对祖国的忠诚、勇敢和智慧,他打下了美国的王牌飞行员。这名美国王牌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击落过德军的十几架飞机,却在朝鲜战场上败在了我们青年空军英雄张积

慧的手里。我把这个事情写下来,作为我考清华大学的命题作文,结果得了高分。另外,我的物理也考得很好。结果我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录取,与我同时考进清华大学的巴城中学毕业生还有十几个人。

### 三、被打成右派

我这个人的性格可能从小就定型了,直脾气,干事情执着,天生爱打抱不平。我回来后在清华大学念了四年半的书,1958年毕业前夕就被打成了“右”派,然后被带戴帽分配到广西进行改造。在反“右”初期,我算是积极分子。“反右斗争”开始时并没有搞得那么极端,讲的是教育为主,就是通过运动使大家都受教育。开始时说在教师队伍中不搞反“右”,后来反“右”斗争扩大到教师中,又说在学



75  
1945-2020

# 出身印尼的首位华侨市长 石琪高历尽坎坷业绩辉煌(三)



原柳州市市长石琪高

生中不搞反“右”后来学生中也搞了,当时的“反右斗争”就这么逐步的扩大化了。

清华大学的反“右”扩大化先从教授开始。有位数学教授课讲的非常好,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了这个教授已经是“右”派了。要求学生只能听他上课,课前不准起立,也不能给他鞠躬,他也不准给学生鞠躬。特别可怜的是这么一位老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讲了一句话,说苏联进口的机器太笨重了,就是讲了这么一句话便被打成了“右”派。

在最初阶段,我还是反“右”的积极分子,当时批斗钱伟长老教授我也很积极的。我记得,在“反”右运动中“中国青年报”还刊登了记者采访我时我讲的一句话:“‘反右派斗争,是一种清醒剂’。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师

被批判,我觉得这个事情搞得太过分了,就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当时整个反“右”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就在这个当口提了意见。我说党不能对运动放任不管,要出来抓一抓了,有这么多被打成了“右”派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运动把学校的秩序都搞乱了。于是有人说我反党,说我对反“右”运动有看法,有不满,这是我的一条罪状。在被打成“右”派前,我是土木工程系学生会体育部的部长,也是黑板报的编辑,会经常给黑板报和校刊写些文章。得到的稿费我都慷慨地请大家吃一顿,这件事情后来也算是我的一条罪状,说我用资产阶级的金钱腐蚀同志。现在看起来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可当时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

没过多少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1958年2月4日立春那一天,我们宿舍和走廊里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人通知我,今天你就不要去上课了,也不准外出,就在房间里呆着,准备接受批判,就这样我成了“漏网右派”。

本来我还有个弟弟、两个妹妹在印尼,1952年就我一个人回来了,全家人都不同意我回国,只有父亲还比较支持我。1960年我的弟弟和两个妹妹也都回来了,当时印尼排华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城市并没有波及,他们完全可以不回来,是我把他们动员回来的。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1958年10月份开始我每月才拿二十七块五,无法养活他们,他们回来以后根本无法生活,就把带回来的三部单车给卖了,后来为了生活又把所有的金银珠宝都卖了。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很单纯,甚至可以说是幼稚,我认为这是党对我的考验,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就是在那种情况,我对党也没有二心,还是动员我弟弟妹妹回国,他们回来后看到我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也很不理解我,说我是个骗

子。1964年我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去了香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回不了印尼,只能呆在香港,他们跟别人讲都是说:“回国被我哥骗了。”在那种情况下我真是说不清楚,他们不理解我也是有道理的。我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人最伤心的事情是不被理解,特别是不被亲人理解。

我当时回国的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印尼不是我应呆的地方,我要回到我的祖国。我动员华侨回国也是讲这个道理,只有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的新中国才是我们自己的家。我动员他们回来,他们回来后都吃了很多的苦,他们也是到处骂我,也说是我把他们骗回来的。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从来没有告诉我父母我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事情,也从来

没有讲过我拿多少钱。而我的母亲在印尼那边宣传的却是我在国内拿的工资是上等工程师水平,我过得很好,弟弟妹妹回来跟我过肯定会很幸福。1953年我考上清华大学,在这之后不断地写信回去,父母每次收到我的信都非常高兴,我寄回去的照片把家里都贴满了,他们想以此方式来告诉周围的人,我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他们为有我这样的儿子感到光荣和自豪。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跟他们讲毕业后我每月只拿27.5元的事吗?我能讲我被打成“右”派了吗?我能说祖国已经把看成是“阶级敌人”了吗?如果我这样讲不就是对祖国的污蔑吗?自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不敢跟亲人讲,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柳州领导看望老领导石琪高





# 出身印尼的首位华侨市长 石琪高历尽坎坷业绩辉煌

四

接上期

## 二、“文革”死里逃生”

“文革”期间我曾经在批斗中被打断了两根肋骨,有两次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决定我的生死,结果我还是活下来了,作为一个“右派分子”,在“文革”中我是哪一派都不能参加的,但这也逃脱不了被专政的命运,两派中的一派把我拿出来游街,并把我关押在单位内,不准自由活动。其他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游街帽子是六十到八十公分高,我的帽子有一米高,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着“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游街时沿途不断受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谩骂和攻击。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就逃跑了。当时我和我爱人还没有结婚,她在鹿寨县插队。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到鹿寨县去找她。可还没有找到她就被当地农民发现了,他们把我抓起来,用手指粗的麻绳绑了我一天一夜,到现在我手上还有当时被捆的痕迹呢。第二天我被拉出去示众。那次批斗非常危险,我差一点就被打死。为什么没有死成呢?我爱人得知我去找她的消息后,马上跑到鹿寨县武装部队报告,说石琪高是个归侨,被造反派抓了,被打得很厉害,有生命危险。武装部的政委亲自赶到现场,制止了造反派的施暴,把我给救了。如果我爱人带的人再晚几秒钟到,我可能真的就被他们打死了。

那次没有打死我,但打折了我的两根肋骨,我的牙齿也被打掉了4颗。即使把我打成这样,造反派也没有放过我。他们把我从鹿寨县押回了柳州市,我被蒙着眼睛关在市委礼堂里整整42天,这42天真

是无法想象我是怎么过来的,那真是叫暗无天日啊!是什么布蒙着眼睛,我都不知道,就这么蒙着眼睛躺着不准起来,想解大小便要报告,然后由一个打手拿着棍子带我到厕所,眼睛依然被蒙着。吃饭时蒙着眼睛坐着吃,吃完躺下,眼睛还是蒙着。吃的东西就是一顿饭、一个菜,我数了数,菜里最多只有12粒小豆子,一天就一顿饭,根本就吃不饱。造反派就这么做,就是给你点吃的,保证死不了让你活受罪。“文革”中我可受了大罪,有很多故事没有时间,去讲。

## 三、首位华侨市长

我这个“右派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当上了柳州市的市长。1983年广西党委对柳州市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我和田民搭档,他当书记,我当市长。20世纪80年代初“右派分子”当市长的情况,在全国我是唯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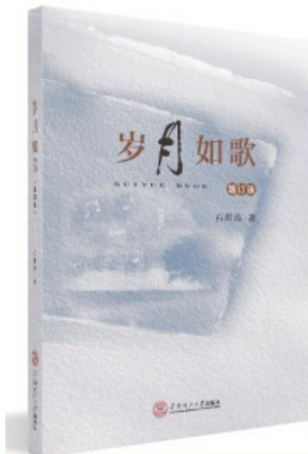
在我的记忆里,我

很快就被摘掉“右”派的帽子。1958年2月4日我被拉出来批斗,8日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庆的那一天我就被摘帽了。那个时候摘帽的不多,我之所以能被摘帽,主要是因为表现好,劳动积极肯干、开会主动发言、能安分守己地改造。当年和我一起摘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位作家,叫秦兆阳,《前进在田野上》这本小说的作者,他在柳州机械厂劳动,我在柳州市政工程处劳动。”

1986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来采访我,写了一篇题为“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这个题目出自唐诗。在私下与我聊天时这位记者说我能当上市长有三个突破:一是“右派分子”平反后能当正职领导职务的在我之前没有,不论职位高低都只能当副职;二是归侨领导干部通常都是副职,我能当上正职也是一个突破;是我从正科级干部一下就提升为正厅级,这又是一个突破。当市长之前,我在柳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上班,这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建筑公司,后来被提升为副经理也只相当于正科

级,1983年直接被提为柳州市市长,提升跨度之大在此前是没有的,我算是“坐火箭上来”的干部。从那以后,这样的事情也没有,我算是空前绝后。

社会普遍认为,当官能当到市长这个份上的人总有点背景,要么是老红军的后代,要么是其他什么条件……,一个归国华侨怎么能当上市长呢?在当时那种社会舆论背景下,很多人对我当上市长的事很不理解。于是,有人找当时重用我的田民书记,问他为什么要选我当市长。他回答道:“我就是专门要用那些有能力的“右派分子。”在他看来,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有一部分是精英。3除了我,他还用两个“右”派分子当厂长。我被市委市领导发现是在柳州市“群英会”上,柳州市每年都要召开表彰先进工作者大会,也叫“群英会”。我曾经四次代表市建二公司出席大会,我的事迹市领导也因此知道了。市领导看我是个归侨,又曾经被打成“右”派,就非常关心我。当时柳州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叫欧济文,延安抗大出身,我当市长就是接他的班,是他最初发现了我,他曾专门派人去看我。当时一家50人只住在一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





75  
1945-2020

# 出身印尼的首位华侨市长 石琪高历尽坎坷业绩辉煌

## 五



里,条件非常差,他了解情况后很感动,又了解到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就想重用我。有记者曾经问田民书记,听说你和石琪高很熟,他当上市长完全是你一手提拔而成的。田民书记回答说,从没有这样的事儿,我原来根本不认识石琪高。我和田民书记原先确实不认识,最初发现我的不是田民,而是欧济文。

1983年初,党中央有一重要文件规定,各级领导一定要选拔“四化”人才,即具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背景的人。根据“四化”的要求,柳州市市长人选当时由各部门,各单位提出1000人,第二次筛选到600多的人,再精选到410人,最终剩下5个人。每次都有我的名字。当时我的情况比较符合中央有关“四化”人才的要求。从革命化来说,当时我完全可以回印尼继承财产,但我没有回去,这是有记载的,这说明我爱国。

从我一生的思想成长逻辑来说我也不可能再回印尼,我是坚定地要跟共产党走的,这一点我确实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样一个爱国华侨在政治上可靠的。我是20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生,在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面也没什么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有我这

样学识背景的人非常少。我还连续四次参加“群英会”,是市二建公司劳动模范,从个人表现看也没的说。最后定了5个人选,个市长4个副市长,但谁当这个市长还是定不下来,最终田民书记推荐由我当市长,他讲了四个理由,石琪高一是热爱祖国;二是清华毕业;三是劳动模范;四是表现优秀。

#### 四、三个晚上没有睡觉

1983年12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决定由我当柳州市长,31日通知我开会。当时柳州市委会议室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获知让我当市长的消息后,我都蒙了。会议上我一时讲不出话来,会议怎么开的也不知道脑子里尽是考虑这个市长怎么当。在这之前,政府的任何部门我都没有去过,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一下子就当了市长,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回到家里,老婆看我垂头丧气的,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区委领导让我当市

长,她说那不是很好吗?我说好你去当当看。真的,当时我没有感到丝毫的兴奋,我有整整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第一次参加市委常委会会议时,我讲了一席话,没有讲别的,就是讲我的压力太大。田民书记说:“好我选对人了,假如说你当了市长以后还能睡大觉那就不行了,你睡不着觉正说明你有责任心。你一定能干好的。”

我是1982年12月14日入党的,1983年12月14日应该转正,但没有按期转正。12月31日市委第一次召开常委会的时候,田民书记问我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已经到了转正的日期但还没有给我转正。他当即打3一个电话,第二天我的转正问题就解决了。党内有规定,党龄必须在5年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就任市委常委,那个时候我刚刚转正,按规定没有资格参加常委会的。而田民书记的主张是,市长不参加常委会无法开展工作。他就此事请示了自治区党委,

经区党委会同意,我可以列席常委会,并可以列席每周一次的书记碰头会。列席会议者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每次开会时田民书记都让我先讲话,他要我大胆地讲、大胆地干,错了是他田民的,成绩是石琪高的,他说,他是老党员,是书记,应当承担责任。在这样的书记领导下做事情怎么能不大胆地去干呢?老百姓都说石琪高当市长时做了很多事情,实际上我心里明白,没有田书记支持、鼓励和帮助,我是很难做出成绩的。当时我和田民搭档的那个班子是很团结的,田民书记非常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从清华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柳州市政工程队。我记得是1958年9月12日来的,当时市政工程队一共才29个人,1959年一下增加到200多人,遂改名叫市政工程处。人员增加了以后,就派了一个转业了解放军大尉来担任书记。我是带帽“右派分子”,按规定拿不到正式的工资,只能拿一点生活费。1959年10月1日我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生活待遇没变,我的身份也没变,仍是“右”派,国庆节之前叫“戴帽右派分子”,“右派分子”的身份还是去不掉。当

时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的工资应该是48元,第二年转正就是54元。摘帽以后的生活费一直是27元5角。直到1962年7月我才按应届毕业生标准拿到48元钱的工资,当时我的很多同学的工资已是68元了。1963年我的工资才变为54元,直到当上市长,才涨到70多元,落下的这几级永远也补不上了。

#### 五、怎样当好市长?

当了市长以后,我总是想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市长?后来想一个办法,从我的优势出发来当市长。我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我就从抓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及环保做起,把我熟悉的事情先管好,其他的事逐步地上手。

财政工作我交给了当时的常务副市长董世忠管好,人事权则交给了杨基常,他是当时的副市长。这些重要的权力都不抓,我就专抓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及环境保护。当初有些人就说我石琪高真笨,关键的人权和财权不抓,光抓个城市建设有什么用啊!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是正市长,他们做出的任何成绩都有我一份,而且50万元以上的大开支还必须通过我来审批,重要的人事安排也要经过我,





# 出身印尼的首位华侨市长 石琪高历尽坎坷业绩辉煌

六

再交给党委会集体讨论。后来大家都承认，还是石琪高英明，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城市建设，楼房盖多了、道路修宽了、工资增加了，他们就会叫好。老百姓不管是谁抓的财政，是谁抓的人事，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拥护谁。前几天有一个孩子问他奶奶现在谁是柳州市的市长，他奶奶还说是石琪高呢。说句实话，我当市长的那几年，真的是为柳州市的老百姓干了一些实事，柳州市的老百姓对我的印象也很深。

我正式退下来是1997年满65岁的时候。从1983年12月到1989年3月我当市长当得都比较顺，1988年2月田书记调到区里去当人大副主任，主要领导工作变动后，我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1990年3月我被正式立案调查，1990年6月我被停职审查。1992年我已满60岁，曾先后两次打报告要求退休。1997年领导找我谈话，我才正式退下来。

在接受审查期间，中纪委派了两个人，监察部也派了两个人，区纪委、监察



厅都派人来对我的情况进行复查。中纪委的批文是：证据不足，定性不准。中纪委的结论下达后，最后给了我一个不影响提拔的党内和行政1严重警告的处分，这算是最后的结论了。

### 六、五项政绩

2000年8月柳州市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班子成立。上级派了一个新的书记来，叫沈北海，现在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沈北海书记上任没几天就到我家来看我，一进门就叫我石市长，说我来看望你了，你是柳州市的有功之臣。听他这样称呼我，我很感慨地对他讲，敢到我家来看我的书记有两个，第一个是田民，第二个就是你。他接着说：“我来看你两个原因，第一，你是柳州有功之臣；第二，我要请你出

山帮助我们。”我立马答应说可以，我说你这样看重我，我有很多想法可以提供给你参考。对于我来讲，一定做到召之即来，来之即能战，战之能不能胜就看你了。他说，我们准备成立一个顾问团，你一定要来参加。就这样，我就算是重新出山了。但对当年我的那些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正确的说法。不过，现在我仍然是正厅级，我也就不去较那个真儿了。

当年，中国侨联法律部主任、一级律师、印尼归侨梁钦汉，专门查我的事情。他从老百姓那里给我总结出五项政绩：一是办教育，二是修道路，三室建商业，四是发展轻工业，五是治理环境。我在任期间建立了广西第一所全日制大学广西工学院，我兼任院长。我

组织修建了广西商业第一楼三十层高的工贸大厦。

在经济发展方面，1985年和1986年上半年柳州市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经济效益最好的十佳城市，且均排在首位，我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藏富在企业”。我上任是柳州污染很严重，江的两边都是破破烂烂的民房。我组织全社会修筑江堤，第一次实现了政府不掏钱搞城市建设。开始时向社会集资150万，等到堤的大体轮廓修起来之后，再向社会公开提出，谁要在堤边盖房子，谁就出钱把江堤完善起来，用这种方法就把柳江上主要的一段江堤建好了。当时柳州市政建设的这种运作方法是很具有开拓性的，在这之后，全国有很多城市建设都借鉴了我的这套做法。

我从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得到的感悟是：人生道路一直都是平坦并不一定是好事，坎坷可能是人生的财富。

回顾自己坎坷的人生也算是一种乐趣吧，挫折并没有压垮我，我现在的身体和健

康。想想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那些老师们很多都活到八九十岁，他们吃过更多的苦，还能那么长寿，关键就是做人的心态一定要平和。

所以，我个人把三件事情看得很淡：把金钱看得很淡、把坎坷看得很淡、把官位看得很淡。我还总结了四句话：地位是暂时的、友谊是永恒的、财产是儿女的、身体是自己的。我经历了那么多事，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我，我回国报效无怨无悔。我这个当年立志回国报效的热血青年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中几经磨难，几乎丧命，又从一个个“右”派分子当上市长，为柳州人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虽然此后我又受到了一些委屈，但说句老实话，我已感到非常满足……

从1991年我的问题定性到1997年正式退休这一段时间内，我在家里闷头写书，想通过写作来给自己画个句号。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共同编写《探索与思考》、《探索与实践》、《探索与发展》。三本书都是田民同志写的序言。每一本书我都写了一两篇文章，如《我的柳州梦》、《永恒的主题》等。第四本书是文集《岁月如歌》，也是田民书记负责写序，2011年出版。完

